

法国耶稣会在华创办高等教育滞后的原因探析

——以天津工商大学为个案

张桂琴

【摘要】 天津工商大学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华创办的唯一一所大学。从1860年开始酝酿到1921年创办,历经六十年的风雨历程。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华创办高等教育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政府对华政策和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滞后,天主教各修会间的矛盾对立和来自中国政府的抵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天津工商大学;天主教耶稣会;晚清政府

【作者简介】 张桂琴,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保定 071002)

一、法国政府对华政策和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是其在华发展高等教育滞后的的重要因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在毛瑟枪和大炮的伴随下又堂而皇之地传入我国。此时法国政府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了保教权。1860年10月25日签订《中法北京条约》之后,法国政府就有以教会名义在天津创办一所高等学校的意图^①。然而事实上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却没有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

(一)法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意图是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扩大对华贸易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对外连绵不断地发起战争,尤其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导致对华贸易极其薄弱。因此,法国政府欲以宗教势力的扩张来弥补经济势力的不足,企图达到与英美相匹敌。于是在保教权招牌下,凡有关天主教在华的一切事务,皆由法国驻华公使出面处理,代行罗马教廷职权。同时,在来自不同教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法籍传教士始终占了绝大多数,在华形成了一支独特的专为法国谋利益的传教势力,“不以买卖为事,专在中国传教”^②。

晚清时期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凭借法国军队作后盾,一改过去的谨小慎微,变得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天主教会不仅在中国各地自由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而且利用霸占的土地,建造房屋,进行房产租赁,以此谋利。天主教会还拥有武器,私设公堂,大搞教民村。天主教士在土地购置方面巧夺豪取,为所欲为,实质上是对当时羸弱的中国进行强权侵略。

以土地为生的中国农民的反抗、自卫必然导致教案的发生,在很多地方农民反洋教的矛头直接指向法国。

每当发生教务纠纷甚至是教案时,传教士总是请驻华公使出面,而公使常常依靠保教权恫吓或以武力威胁来平息冲突,最后以满足他们种种不合理的侵略要求而了结。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说过:“对这个国家(中国),我们也有经验,在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③在法国政府的保教权下,天主教传教士与法国驻华公使相互勾结与利用,传播福音同殖民扩张相辅相成,从而使在华天主教会带上了浓厚的殖民主义的色彩。

(二)法国天主教的传教策略和对象阻碍其在华兴办高等教育事业

晚清来华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们抛弃了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开创的“学术传教”以及重质量而不单纯以数量的扩张作为目标的策略,而是长期侧重于在农村大规模发展教徒。因而,中国社会下层贫穷的农民中天主教徒较多。到十九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八百多人,全国信徒发展到约七十四万人,到1921年猛增至二百余万。^④

为了发展更多的教徒并对教徒及其子弟进行宗教教育,天主教各教会开办了很多学校。“天主教会拥有学校,这一点无可怀疑,但是它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⑤这些学校几乎都是为了加

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几乎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天主教在办学经费方面,一部分依靠在中国的大量房地产的收入和国内外教徒的捐献,另外还有租界税收支付和勒索的教案赔款。天主教各教区、修会或教堂根据自己的力量创办高级小学、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天主教教会学校办学条件较差,资金不足,造成天主教办学层次低、办学水平不高。

相反,新教学校和学生的数量远不如天主教,却比较重视发展中等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依靠势力强大的英国、美国政府的支持加上社会团体或个人出资,“新教在中国创办了许多高等学校,新教一直试图垄断中国的高等教育”,“相比之下法国政府直到现在没做什么,还在观望”,“天主教看起来象是因为没有能力与其对手在科学教育界较量而落伍了”。^⑥二十世纪初期,新教在华创办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已增加到十三所。而天主教大学仅有上海震旦学院一所,并且是由中国爱国天主教教徒马相伯发起、英敛之出资于1903年创办的。

二、法国天主教各修会之间传教使命和方法的矛盾不利于其在华发展高等教育

法国政府对在华建立高等学校的定位是“为公使团创办旨在培养外交和文秘人员的欧式大学”^⑦。1861年,法国公使曾请求天主教遣使会士负责这一项目,但是遣使会士回答说“除了培训神职人员的大神学院,他们不负责其它教育教学事宜”^⑧。法国公使转而委托耶稣会士到天津开办高等学校,受到北京遣使会的抵制。1867年,法国政府要求罗马教廷协助,教廷指示由富有办学经验的耶稣会酌办,耶稣会却说“天津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他们不能没有授权就在别人的地盘上落脚”^⑨。各修会之间不仅争夺势力且传教方法不同,使得法国政府意图创建高校的事一拖再拖。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直隶省设有三个教区: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北部教区(含天津)、以正定为中心的直隶西南教区和以献县为中心的直隶东南教区。前两个由遣使会士管理,后者则由耶稣会士管理。^⑩这两个修会都是天主教的修会组织。他们在教区划分上都有长期比较固定的活动范围,较少互相干扰。各个修会的行政、经济都是独立的,各个修会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一般都能互相配合,在对华态度与传教政策上相对一致。但这两个修会对传教使命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着意见分歧,耶稣会与遣使会的冲突由来已久,所以对办高等教育持

相反态度。

明末清初耶稣会的先驱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由于在华卓有成效的传教工作,被称为“沟通欧洲与远东文化的桥梁”^⑪。他们在中国广大地区建立起活动据点,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来华的其它教派的传教士,“由于信念和派别的差异,因此他们嫉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⑫,以致“礼仪之争”掀起了天主教内部不同派别的争执,使得中国的皇帝(1720年)决定禁教,后诉诸教廷,耶稣会于1773年被教皇解散。耶稣会在华经过千辛万苦建立的教区(包括北京和天津教区)统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耶稣会士恢复了在华的活动,“大有重振当年在华雄风之势”^⑬。他们曾设想重复利玛窦当年的传教方式,谋求进入北京,结果事与愿违。而占据北京和天津的遣使会士一直千方百计阻挡耶稣会士卷土重来。

在中国的传教团体中,遣使会成员也许是最不愿意表现其民族特色和宣扬西方文明的,这是遣使会特有的传教传统所决定的,遣使会本身很贫困(贫困是其宗教修会特意保持的特征,该修会于十七世纪由巴黎的穷人使徒圣樊尚创立)^⑭。遣使会士把“拯救灵魂”尤其是穷人的灵魂作为使命。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属“世俗之事”,应该由政府关注。因此,遣使会士更关心以培养天主教忠实信徒为目的的基础教育和初等教育。

耶稣会士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和势力,非常注重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之中。“运用一切能用的方法,谋求天主的光荣”^⑮是耶稣会传教的宗旨。晚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缺少了利玛窦时期的影响力,却仍然“以学术收揽人心”^⑯作为一种传教策略。他们把上海作为活动中心,在江南传教区内发展科学、新闻传播事业,成绩显著。

1885年9月,献县耶稣会主教步天衢上书罗马传信部,陈述了办学的想法和理由,企图说服传信部同意他们办学。传信部则交耶稣会总长酌办。总长训令献县耶稣会士不易在这伤感情的问题上只顾取悦于法国政府而表示希望接受任务^⑰。不难看出罗马传信部对法国在华的保教权充满敌意,不愿意附和法国政府的意图而造成两个教会之间的隔阂,对法国政府的办学计划不置可否,没有明确给予肯定和支持。

1886年,天主教华北各教区主教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教务会议。献县耶稣会主教步天衢进一步阐明在天津办学的意图,拟说服北京遣使会士。由于遣使会士对耶稣会士早有成见并存有戒心,此问题引

起两会会士之间激烈争吵^③，建校的事宜再一次被搁浅。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时曾委托在京的遣使会主教莫里任主持，结果是“竟辞不受”^④，清政府立刻改新教传教士任总教习。1913年，耶稣会士决定在自己教会属地建一所技术院校。他们将校址改在河间县并开始备料施工。1914年法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献县四名耶稣会士应征入伍，创建学校的计划再度搁置。

法国政府将在中国北方创办高等学校的任务委托给耶稣会士，是基于耶稣会士早期享誉欧洲的教育成就以及明末清初时期在华传教的辉煌历史，同时考虑到耶稣会士对办高等教育的热忱，但晚清时期耶稣会士却无法在自己的教区里——既不是中心城市又没有与外界方便迅速沟通能力的教区里——建立学院。他们在中国北方没有占据适合发展高等教育的教区，加之罗马教廷不积极协调教会之间的矛盾，对法国政府的计划只是敷衍，不予认真协助，使得这一计划几次搁浅。

三、“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以及清政府限制教会不法行为的举措使法国政府的办学项目再次受挫

1885年4月，法国政府重整旗鼓，又着手建校，仍坚持“在天津为中国人建立一所理科院校，由法国传教士掌管，为中国培养人才，让这些人才的智育接近法兰西人的智育，这些人才会有利于两个民族相互关系的增进，这些人才会为打破两个民族间所存在的隔阂作出贡献”^⑤。法国公使巴特纳特召集献县耶稣会的主教和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会长共商创办高等学校建校方案。当巴特纳将这一方案呈交清政府总理衙门请求备案时，总理衙门未予核准。这个方案遭到清政府的反对而再次搁浅。尚建勋(Père René Charvet)曾不无遗憾地说：“各种反对之声使这个方案受挫，随之被否决。假如这个方案当时被实施了，我们会领先竞争对手好几十年发展起来。”^⑥

法国政府在华办高等教育遭到清政府拒绝的原因诸多，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清政府坚持掌握国家的教育主权。清政府认为学校应由中国政府开办，外国人可以在校内任教。这正是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的攘外安内、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清政府的坚持下，后来的教会大学不论是新教创建的还是天主教创建的无一在清政府备案。

其次，令清政府头痛的频繁发生的教案问题。时任清政府总理大臣的李鸿章对天主教并无好感，

但由于“法人以传教为业，久立专条”^⑦，无法禁止，只有照约办事。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既是清政府限制教会不法行为、也是反对教会侵略活动的一个举措。

其三，清政府反感并憎恶法国在华的保教权。李鸿章试图谋求通过外交途径和罗马教廷直接建立关系，以规范天主教的在华传播，清政府与罗马教廷都不止一次地有过直接通使的愿望和行动，但总是被法国人中途阻梗，可望而不可及。^⑧

其四，清政府还没有走出中法战争的阴影。法国侵占了中国的藩属之一——越南，从而揭开了列强瓜分中国藩属的序幕，继而使中国本身也进入被瓜分的危机时期。毫无疑问，清政府对法国深恶痛绝，绝不能答应其在华办学的殖民行径。

法国在华办学方案被清政府否决后，便忙于在欧洲寻找盟友以改变在欧洲处于外交孤立地位的局面。在华天主教内部又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议。而这时从列强的侵略与凌辱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要了解外国，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制度，兴办了教授“西学”以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翻译、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的新式学堂。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创立到十九世纪末，洋务派创办了近四十所新式学堂。

面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以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迅速作出反应。为了与中国清朝政府举办的众多高级学堂竞争，新教传教士们开始了创办高等教育的尝试。新教利用原有的教会学校扩大招生，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层次。利用在国外“立案”等办法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到十九世纪末，新教在中国创办了五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美国政府在办学经费和师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而法国政府虽很早就有在华创办高等教育的意图，天主教耶稣会士也满腔热情地去操办，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和天主教在中国都没有地位”^⑨，在发展高等教育这一领域无所建树。

四、罗马教廷收回对中国教务的管理并废除法国在华保教权

时至二十世纪初，美英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了一所又一所大学；中国政府自办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还有省立和私立大学也陆续开办起来，而“独我罗马圣教，尚付厥如，岂不痛哉！”^⑩中国天主教界南北两位领袖英敛之、马相伯曾于1912年联袂直接上书罗马教皇。他们呼请教廷派遣教中

博学硕德、明达热切之士来华创办大学(即1923年成立的辅仁大学)。1917年6月,英敛之撰写了《办学罪言》,开宗明义地痛斥天主教会在华传教的种种积弊及愚民政策,要求在华兴学,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中国天主教徒要求在华兴学的爱国热情以及在华“天主教几经努力都没能进入中国的知识教育领域,这种状况让罗马教廷传信部的劳兰蒂枢机主教非常担心”^⑧。1918年7月,罗马教廷要求直隶耶稣会教区向圣部汇报中国教务。耶稣会的报告中陈述了在华传教不足之处是高等教育机构太少,再次强调:“中国还是一个非公教国家,奉教的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占优势。为打进这两个阶层,必须成立高等学校。”^⑨1919年10月,罗马教廷派宗座巡阅使光若翰总主教(Jean B. M. de Guébriant)巡阅中国天主教状况。各地司铎及教友认为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尚属缺乏,乃目前急待开展的工作。于是,教廷开始对天主教在华办学给予非常关注。

1919年11月,罗马教廷向全世界教会发布了一个通谕,即“夫至大”通谕。通谕认为,一个在异国为上帝传福音的人应当置父母之邦的利益和光荣于教会之下。因此,“夫至大”通谕反对民族歧视。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通谕中提到通过教育提升、陶育本地司铎。就是说提倡在传教地创办如同西方各国的天主教大学。这道通谕中许多地方切中了在华天主教会的积弊。^⑩通谕的颁布,可以说是罗马教廷对法国在华保教权的否定,明确支持或提倡天主教士在传教地创办天主教大学。

1920年7月30日,传信部劳兰蒂枢机主教为了尽快促成在天津办高等教育的事宜,亲自出面解决耶稣会与遣使会之间的争议。他分别致函直隶东南教区的耶稣会和天津教区的遣使会,传达了罗马教廷打算重新划分直隶海滨教区的边境,将天津市划归耶稣会教区,并委托耶稣会士在天津成立一所高等学校的建议。不久,耶稣会与遣使会在天津达成许可耶稣会士在天津办大学的协议。^⑪至此,耶稣会与遣使会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端,在传信部的调停下,终于以法国耶稣会获得在天津创办大学的权力而宣告结束。

1921年7月直隶东南耶稣会教区的神甫于溥泽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天津所开办大学的代理院长,负责筹备建校事宜。于溥泽神甫选定天津马场道清鸣台旷地一百余亩作为校址,开始了建设。1923年9月,大学开始招生。这所大学叫天津工商大学,在

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Sacré-Coeur)”。

天津工商大学的创立,弥补了天主教耶稣会在华传教三个多世纪,却在创办高等教育方面无所建树的缺憾,部分地实现了罗马教廷对外扩张天主教势力和法国在华扩张殖民势力的目标。天津工商大学三十年的创建过程是法国殖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与晚清社会利益、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碰撞,具有扩大侵略利益和进行文化征服动机。但客观上讲两个国家、两种文化通过冲突和碰撞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交流,在两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注:

①沧州宗教志. 打印本, 168.

②贾祯等. 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28.

③卫青心. 罗马教廷与中国[M]. 黄庆华译. 18. 顾卫民.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M]. 99.

④⑤⑥顾卫民, 杨国强. 二十世纪初在华天主教会的中国化[J]. 档案与史学, 1995. 5.

⑦唐纳德·帕拉贡. 英敛之和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兴起[M]. 辛岩译. 171.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于溥泽. 创建天津工商大学[J]. 耶稣会在中国, 1923, 3, (59): 5-7. 现收藏于法国耶稣会档案馆(à Vanves).

⑳㉑㉒㉓㉔㉕吕志毅. 河北大学前身——天津工商大学创建背景[J]. 河北大学学报, 2001(3): 179-181.

㉖利奇温.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 朱杰勤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129.

㉗白晋. 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M]. 冯作民译. 台北: 光启出版社, 1977. 38.

㉘巴斯蒂.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J]. 历史研究, 2001(1).

㉙耶稣会会宪. 第636款.

㉚费赖之.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M]. 玛承钧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8. 42.

㉛㉜马相伯, 英敛之. 上罗马教皇兴学书[J]. 辅仁生活, 1939(2).

㉝尚建勋. 天津工商学院二十五周年校典[J]. 耶稣会在中国, 1949(1). 现收藏于法国耶稣会档案馆(à Vanves).

㉞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五五.

㉟解成. 河北省天主教历史编年[Z]. 铅印本 293, 172-173.

责任编辑: 郭红霞